

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类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信念。

从而展现出创新人类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为我国的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对人类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信念。

金融危机、安全危机、生态

与我国的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本书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类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信



从而展现出创新人类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人类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为我国的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余金成 郑安定 余维海 著

本书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类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信

从而展现出创新人类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为我国的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人类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信念。

本书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类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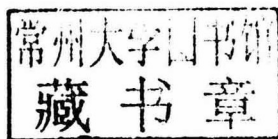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项目编号：12BKS0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人类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余金成 余维海 郑安定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 余金成, 郑安定, 余维海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201-15580-7

I. ①中… II. ①余… ②郑… ③余…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4358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ZHONGGUOTESESHEHUIZHUYI YU RENLEI FAZHANMOSHI CHUANGXIN YANJI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s.com>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s.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王佳欢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75
插 页 2
字 数 350千字
版次印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 录

序 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 001

导 论

现代资本主义三大危机要求人类创新发展模式

第一章 世界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疏离 / 041

一、经济危机的发生逻辑与历史叙述 / 042

二、资本主义预算软约束与金融危机 / 044

三、国外左翼力量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反思 / 045

第二章 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个体本位价值原则的缺陷 / 052

一、生态问题的根源与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释读 / 053

二、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意蕴 / 057

三、国外左翼政党和学者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 / 059

第三章 非传统安全危机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政治治理的失序 / 065

一、资本扩张与帝国主义的干涉逻辑 / 066

二、资本积累的区域转化与恐怖主义的涌现 / 068

三、国外左翼政党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及其实践的批判 / 073

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困境 / 086

上 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人类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第四章 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新确证 / 098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099

二、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传统视角及危机 / 110

三、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视角 / 126

第五章 市场经济——张扬人类生命活动特性的重要场域 / 132

一、市场经济是人性完善的必由之路 / 135

二、现代市场经济孕育着自我扬弃的客观条件 / 142

三、市场经济中部分人富裕向共同富裕的转变 / 146

四、市场自由竞争向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趋近 / 149

第六章 中国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形态 / 152

一、中国奇迹的密码在政治领域 / 153

二、权力介入市场的中国方案 / 165

第七章 新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文化优势 / 176

一、观念形态视域中的权力与市场 / 176

二、国家经济职能重建的文化优势 / 189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三项内涵的生成 / 197

四、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三大职能的统一 / 208

下 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人类发展模式的现实性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216
一、邓小平执政时期对市场经济的选择	/ 217
二、江泽民执政时期对市场经济的坚持	/ 228
三、胡锦涛执政时期对市场经济的改造	/ 239
四、习近平执政时期对市场经济的完善	/ 251
第九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认了资本与劳动一致性	/ 261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与实践	/ 262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牵手的特定历史环境	/ 277
三、按劳分配的辩证内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284
第十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构了无产阶级解放条件	/ 307
一、西方学界对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的质疑和否定	/ 308
二、应该从三个层次认识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学说	/ 321
三、中国改革与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现代化	/ 333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了人类发展模式	/ 347
一、三大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冲击	/ 34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三大挑战逻辑的回应	/ 354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361
结束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掘双重劳动资源,创新人类发展模式	/ 365
主要参考文献	/ 395
后 记	/ 407

序 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一开始就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并致力于探求人类理想的发展模式。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面对大机器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主张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而代之；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推动俄国、中国等落后民族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中国通过改革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安全危机、生态危机，所推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要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回应人类面临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建构人类新型发展模式，实现该目标，无论是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都需要经历长期的探索过程。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①“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当今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发展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工程当然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事实上，自邓小平以降，历任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其理论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

成果构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线,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此为目标的各抒己见、学理探究,构成了党领导实现该目标博采众长、集思广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当代,一方面,中国改革历经四十多年攻坚克难,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代表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生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百余年的震荡调整,所实现的法制体系、民主政治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从传统侧重体力劳动模式向现代侧重脑力劳动模式的转变,进而使两种制度的重大区别从“有无剥削”转变为“何种平等”。中国提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原则,同时也是两制关系原则,代表着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型关系正在形成。

上述事实表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着新形势,中国改革已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这要求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即从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层面,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方位,从理论上提供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当代证明。所谓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该以此作为基本内容;而明确其问题所在,确定其方法原则,确认其基本思路,则成为发展该项研究的重要遵循。

一、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理论难题

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

论创新。”^①中国共产党人所设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了21世纪中叶将相继完成,这不仅意味着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为动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会成功定型,也意味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会最终生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并引领这一实践领域的重大变化。显然,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中国模式”,转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都与此有关,其中出现的各持己见、众说纷纭的现象则客观呈现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需要面对的理论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明确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运用商品经济,所以当改革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学界几乎在所有重大逻辑节点上都经历了不同观点的对峙。

1. 在分配问题上

许多人只注意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原则,把按资分配视为资本主义原则,忽略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一致性。例如刘国光据此认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能丢了这个论断。它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人产权的发展,容许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收入,但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为前提,不能让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也应该扭转按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为主的趋势……只要保持和强化公有制这个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②

在这里,刘国光所设置的底线仍然是从生产关系要求出发的,即“不能让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不能让按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一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② 刘国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观点忽略了按资分配是按劳分配的衍生现象,也是其升级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必然导致按资分配,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试图杜绝按资分配现象,其路径选择只能是限制按劳分配,其结果必然会限制劳动,尤其是限制劳动能力强者的劳动,这是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把从生产关系出发的目标模式转变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结论,即把劳动者能力的解放和释放作为最高原则,而所有制和分配问题则相应成为服从劳动发展的条件,这必然会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至于在实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因劳动能力差别所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则可以通过政府发挥促劣变优的作用形成补偿机制,一旦劳动者在能力水平上趋于接近,就能够为共同富裕提供越来越充分的主体条件。这一实践模式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

程恩富正确地把“劳动”和“资本”都视为对生产做出贡献的要素。他认为:“其实,‘按贡分配’归根到底可以分解为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与资本所得或按资分配。当把管理、技术、信息等作为劳动来看待并参与实际分配时,它们属于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的范畴;当把管理、技术、信息等作为资本来看待并实际参与分配时,它们属于资本所得或按资分配的范畴。”^①但他却提出:“目前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快速下降和私有制经济比重的大幅上升,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首因或根本原因。必须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振兴集体经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采用各种综合调节措施,以便制止贫富分化和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②程恩富的观点不无道理,但他在这里仅仅把所有制视为分配条件,忽略了所有制同时且首先是生产条件。传统社会主义试图运用覆盖一切的公有制来解决人们的社会平等问题,就是仅仅把所有制作为分配条件。传统社会主义虽然形成了人

①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王朝科、朱奎:《“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

们普遍的经济平等关系,却忘记了所有制也属于生产条件,需要与劳动能力相一致,结果是付出了牺牲生产力发展的代价。

上述观点没有注意到,中国改革提出所谓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实质上就是打通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壁垒。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①传统社会主义通过否定按资分配来消灭剥削现象,付出的代价是限制了劳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的最大突破就是通过认同“按资分配”的合理性,解放了劳动。^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止步于由此所加剧的两极分化。

2. 在所有制问题上

周新城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所以一般地讲,市场经济的运转应该服从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运行应该有助于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按照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方法、手段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必然要由某个行为主体来运用它:或者是由公有制经济来运用市场这种手段,或者是由私有制经济来运用市场这种手段。怎么运用市场这种方法、手段,要由行为主体根据需要来定。行为主体决定采用什么方法、手段,而不是方法、手段决定行为的主体。”^③周新城批评市场经济崇拜是有道理的,有些人一提到市场经济,就希望向资本主义模式看齐,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周新城硬化公有制价值地位同样存在问题。对于理想社会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而言,所有制同样具有方法、手段这个性质。按照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② 参见余金成:《按劳分配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四次解读》,《理论学刊》,2016年第3期。

③ 周新城:《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1期。

史观,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生产力,而不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①

有学者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放弃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就意味着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②这一判断似是而非。在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首先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使之成为“本质特征”则有悖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即他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判断,可以概括为“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内容。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改革是从破除“公有制崇拜”开始的,时至今日,学界仍然徘徊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因为混淆了公有制属于“特征”和属于“本质”之间的不同。其实,社会主义命脉所系或本质规定不是公有制,而是生产力。当年,马克思突出地强调公有制,恰恰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能形成最高水平的生产力——他是从先进生产力角度肯定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两相比较,生产力是“本”,公有制是“末”。中国改革千辛万苦,就是纠正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同样是坚持公有制原则,人们混淆了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忽略了前者让公有制同时具备了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双重功能。马克思明确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掌控了生产资料就等于掌控了生产力,也相应获得了特定性质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公有制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建立并维护公有制本身成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后者认为“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有制成为体现该本质的手段和形式,而公有制

① 参见余金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典阐释、改革探索和逻辑展望》,《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9期。

② 刘月等:《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光明日报》,2016年4月17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

主要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发挥作用，虽然该作用归根结底对于形成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有利。与此同时，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公有制经济所产生的按资分配财富，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资源。而且当公有制经济适应了市场机制之后，其进一步发展意味着按资分配数额的增加，这同样是政府行使促劣变优作用的宝贵财富。公有制所具有的这两种独特作用，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区别。所以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公开地、大声地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据此而说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则不妥。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况仅仅与特殊时期有关，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①。言外之意，一旦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旦社会生产力不再处于落后水平，就不再需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是要求重返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这种观点笃信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正宗地位，骨子里信不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手，仅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初级阶段的选择，一旦该时段结束，随时准备予以放弃。

刘国光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应该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邓小平那次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是‘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特征确实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等社会制度的特征，而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则不能这么说，因为其他社会制度在成立的初期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这次谈话之所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包括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是针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还极其落后，而‘四人帮’又在搞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社会主

① 刘月等：《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光明日报》，2016年4月17日。

义更需要发展生产力,以克服贫穷落后的紧迫性。这样讲是必要的。如果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就不会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的说法,而只能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有一篇讲话涉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1990年12月24日他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是与南方谈话中讲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相通一气的,都是讲的生产关系,但是不包括生产力方面的东西。”^①

刘国光的上述观点显然忽略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社会主义代表着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可以并不体现在生产力方面,只要有生产关系规定性即可。这一见解难以让人认同。至于邓小平明确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却被他解释为仅仅针对了“克服贫穷落后的紧迫性”时期。这样一来,人们眼中就只剩下生产关系,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成为可以脱离相应生产力的独立价值尺度。这很容易重返传统社会主义老路。

3. 在政府作用问题上

魏杰提出:“现在有人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看成为‘中国模式’的特征,甚至有人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些观点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要不要提‘中国模式’,这里且不去讨论,但最起码是不能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常态化和制度化,把它看成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体制构成和特征。”^②魏杰的观点包含着合理性,是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原则的张扬。但是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发趋势的市场经济只能导

^① 刘国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② 魏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且深入的改革——“政府主导”是模式还是改革对象》,《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

致两极分化,却无法体现共同的富裕;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执政党首先必须在市场经济中坚持该目标,其次必须通过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努力创造实现该目标的条件。至于如何使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配合,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事情。

比较起来,洪银兴的观点为正确认识政府作用预留了空间。他指出,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不完全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现代发展经济学家针对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家把政府和市场看作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机制的观点指出:“更为有益的是把政府当作构成经济体制的必要要素,它的作用在于有时可以替代其他制度因素,有时则是其他制度的补充。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国家和市场的互补关系必须予以重视。”^①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政府。”^②这一观点至少从一定角度肯定了“政府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客观性,至于如何区别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以及怎么有效形成双方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互动,当然需要通过实践探索才能予以确定。

但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治权力的介入,政府需要主导经济增长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发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并非没有道理。按照笔者理解,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至少体现为政治权力的两大作用:第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并牢牢把控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使其落入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窠臼;第二,持续推进促劣变优,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帮助弱势群体,坚定地缩小优胜劣汰所造成的利益差距。

① [美]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本书翻译组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② 洪银兴:《关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说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10期。

(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形成的“中国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显著实践成果,人们开始关注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模式。2004年5月美国学者舒亚·库珀·雷墨发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引起学界热议。2009年9月14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发表《全球经济掀起中国热》指出,西方模式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中国并非如此,但取得了辉煌成就。哈佛大学教授奈·约瑟夫说,“北京共识”是市场列宁主义的模式。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克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威权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认为,没有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成就在于“实用主义”。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郑永年2010年5月4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一文中认为,尽管西方人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表示质疑,但“中国模式”客观存在。詹姆斯·曼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

徐崇温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始于邓小平。高尚全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中华文化、民主政治。叶庆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政治上集中统一与经济上放开搞活的有机结合,凸显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在经济生活强有力干预的相辅相成。

上述观点不乏深刻见解,但大都强调了“中国特色”而忽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联系。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承认社会主义是规律产物,而中国尚未建立与改革实践相一致的社会主义规律理论。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社会将取代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只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过于乐观地判断了理想社会将很快实现。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清楚地知道,人类真正进入共产主义还需要经历漫长的发展

时期。这样一来,理想社会及其发展模式往往需要经历如下过程:首先,作为确定目标表现为政治理念;其次,作为实现过程表现为运行机制;最后,作为完成形式表现为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创新人类发展模式目标,也展示了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不同,但并没有完成对这一发展模式的最后建构。学界之所以在“中国模式”上众说纷纭,主要是混淆了该模式建构过程的不同阶段,要么突出其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强调了它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夸大了其成熟程度;要么突出其所呈现的过渡性质,强调了其不成熟状态与成熟资本主义的比较劣势,弱化了其成功可能。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道:“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①应该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中国模式”,其诞生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逻辑张力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框架,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注。学界许多人认为:“时代化”只涉及策略原则层次的与时俱进,而无须触动逻辑原理方面的修正。例如杨耕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仍然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并且具有内

^①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